

# 中国思想论集

张永义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 
巴蜀书社

# 中国思想论集

张永义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 
巴蜀书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思想论集:张永义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12. 5  
ISBN 978-7-5531-0006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思想史—中国—文集  
IV. ①B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0468 号

中国思想论集

张永义 著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潘伟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张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<br>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<br>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 |
| 网 址  | www. bsbook. 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巴蜀书社<br>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(028)874273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成品尺寸 | 203mm×140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9. 8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50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531-0006-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8. 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。

# 目

中国思想论集

#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穿衣之道：诸子争鸣的一个话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01 |
| 周敦颐思想在儒家道德形上学中的地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018 |
| 朱子“中和说”略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33 |
| 《药地炮庄》成书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46 |
| 儒宗别传：方以智的庄学史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62 |
| 由《药地炮庄》看方以智的惠施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77 |
| 《青原志略》成书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95 |
| 《方以智晚节考·仁树楼别录》标点正误<br>——兼谈方密之与左藏一的关系 ..... | 107 |
| 以庄继易：钱澄之的庄学观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9 |
| 从《东塾读书记》看陈澧的汉宋调和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44 |

中国思想论集  
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近代墨学的复兴及其原因 .....            | 172 |
| 经、子之别与“国故”问题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章太炎、胡适关于治学方法的论争 .....      | 208 |
| 逻辑分析及其限制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略论张申府、冯友兰和金岳霖思想方法的异同 ..... | 231 |
| 重建形而上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新理学》和《论道》的比较研究 .....      | 244 |
| 从洪冯之争看逻辑经验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.....   | 256 |
| 道家思想对冯友兰“新理学”的影响 .....       | 272 |
| 杜国庠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.....           | 286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310 |

## 穿衣之道：诸子争鸣的一个话题

先秦时期，百家纷争。争辩的内容，除了关乎学派宗旨的大原则外，还有一些具体的小问题，穿衣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人为什么要穿衣服？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宜或得体的？服饰与德行是否有关系？这些都曾引起过诸子们的讨论或关注。问题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，但由各家的回答，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。其中，有些说法对后世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那些大原则、大问题。

### 一、圣人的穿着

说到穿衣服，自然会首先想到孔夫子。这位生活比较考究的圣人不但吃饭有一套原则，如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、“不时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”，穿衣服也丝毫不含糊：“君子不以绀緌饰，红紫不以为袷服。当暑，袗絺绤，必表而出之。缁衣羔裘，素衣麋裘，黄衣狐裘。裘裘长，短右袂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丧，无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杀之。羔裘玄冠，不以吊。吉月，必朝服而

朝。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

钱穆有一段白话试译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：“君子不把玄色纁色来作衣领与袖之边。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起居之服。当暑天时，在室内穿葛单衣，但出外必加上衣。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，素衣用小鹿皮裘，黄衣用狐裘。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，较出门时所穿者稍长，又把右袂裁短些。夜睡必有寝衣，其长过身一半，下及两膝。冬天把狐貉皮来做坐褥。除去在丧事中，大带上没有不佩一切备用的玉器的。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，其余所穿裳，总是开剪斜幅缝制的。吊丧不穿黑羔裘，不戴玄色冠。每年正月岁首，必穿着朝服上朝去。”<sup>①</sup>

《乡党》篇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生活起居的描述，所以文中“君子”所指的当然就是孔子本人了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这段话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白。据后儒的解释，孔子选择衣服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两方面：一是合“礼”。如“绀纁”是用来作祭服的，所以不能作领、袖的饰边。红紫不是正色，所以即便是私居时也不能穿。二是合“时”。如“裘裘长”为的是取暖，“短右袂”为的是方便做事。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可靠，我们总可相信，这段话所讲的孔子决不是早年那个“贱”而“多能鄙事”的孔子。虽然古代可能皮贱而丝贵<sup>②</sup>，但有这么多多种衣裘，并十分讲究色彩、玉器的搭配，那一定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。

和墨子的服饰比较一下，印象当会更深刻：“墨子称道曰：昔者禹之湮洪水、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。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

① 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北京三联书店，2002年，第257页。

② 吕思勉：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15页。

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，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如此。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跂蹻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谓墨。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“裘褐”是粗衣，为穷人所穿。“跂蹻”大概是草鞋或木屐之类。这里说的虽是后世之墨者，但墨子本人的穿着也不会差得太远。荀子就说过墨子“衣粗食恶”、“衣褐带索”的话（《荀子·富国》）。有一位曹公子甚至当面向墨子抱怨：“始吾游于子之门，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，朝得之则夕弗得。”（《墨子·鲁问》）很难想象，极重言行一致的墨子会只让弟子们过那种辛苦的生活。

根据《墨子·辞过》篇，墨子主张“以裘褐为衣”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：“古之民，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茭，冬则不轻而温，夏则不轻而清。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，故作诲妇人治丝麻，拊布绢，以为民衣。为衣服之法：冬则练帛之中，足以为轻且暖；夏则絺绤之中，足以为轻且清，谨此则止。故圣人为衣服，适身体、和肌肤而足矣，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。……当今之王，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。冬则轻暖，夏则轻清，皆已具矣。必厚作敛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。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镂，以为身服。此非云益煖之情也，单财劳力，毕归之于无用也。”

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当墨子称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避暑，不是为了荣观耳目时，他所担心的其实是王公大人追求“文采刻镂”，必定会亏夺百姓的衣食之财。至于百姓衣食丰足之后，是否可以干点“锦绣文采”的事儿，墨子并没有明确的回答。考虑到墨子曾主张给那些贤能之士“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”，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在适当情况下修饰一下吧！要不，人人皆衣褐带索，贤人还要那些爵禄干什么呢？

无论如何，同为当时显学的宗师，孔、墨的穿着打扮如此悬殊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。两家后来围绕着穿衣服的问题展开辩论，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## 二、“服”与“行”

儒墨两家直接辩论服饰的文献，保存在《墨子·公孟》篇中<sup>①</sup>：

公孟子曰：“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，箕子、微子为天下之圣人，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。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或仁或不仁。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。且子法周，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非古也。”

公孟子义章甫、搢忽、儒服，而以见子墨子。曰：“君子服然后行乎？其行然后服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行不在服。”公孟子曰：“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，金剑木盾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，群羊之裘，韦以带剑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，绛衣博袍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此四君者，其服不同，其行犹一也。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。”

<sup>①</sup> 针对同一问题，《墨子·非儒下》也有一段记述，似更能彰显墨家的辩者风采。由于《非儒下》的可靠性有争议，暂且把它抄在这里：“儒者曰：‘君子必古服言，然后仁。’应之曰：‘所谓古之服言者，皆尝新矣，而古人服之言之，则非君子也。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，言非君子之言，而后仁乎？’”

公孟子是谁，我们不太清楚。吴毓江推测说，此人即曾子弟子公明仪，属七十子之后儒家大师之一<sup>①</sup>。两段话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问题，即衣服与行为的关系问题。

按照公孟子的说法，君子成仁有一个前提，即必须说古人的话，穿古代的衣服。公孟子这样讲的理由何在，很可惜文献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。不过，更让我们好奇的是，这种说法属于公孟子个人的私见呢，还是儒者的一贯立场？

公孟之前，孔子好古是出了名的。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、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都是夫子自道。把“古”与“今”对照起来，以古讽今，还是孔子非常喜欢的一种习惯做法，如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、“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不过，对衣服的看法，文献记载却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。《论语》和《礼记》有两则材料这样说：“子曰：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拜下，礼也；今也拜乎上，泰也，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之服，其儒服与？’孔子对曰：‘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也，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也乡。丘不知儒服。’”（《礼记·儒行》）前段话提到，麻冕是古礼，但现在用的是纯（黑丝），因为用纯比较俭省，所以孔子也从众用纯。后段话说穿衣服要入乡随俗，孔子小时候在鲁国，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，长大后住在宋国，戴的是章甫冠，因此并不一定要唯古为尚。

<sup>①</sup> 吴毓江：《墨子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709页。

同是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，《大戴礼记》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：“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‘吾欲论吾国之士，与之为政，何如者取之？’孔子对曰：‘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，舍此而为非者，不亦鲜乎？’哀公曰：‘然则今夫章甫、句屨、绅带而搢笏者，此皆贤乎？’孔子对曰：‘否！不必然。今夫端衣、玄裳、冕而乘路者，志不在于食荤；斩衰、菅屨、杖而啜粥者，志不在于饮食。故生乎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，舍此而为非者，虽有，不亦鲜乎？’”（《大戴礼记·哀公问五义》）这段话在《荀子》中也有出现，内容大体相同。按照这段话，穿衣服就不是随俗的问题，而是“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”。理由是，“服古之服”、“志古之道”才能使一个人干坏事的可能性降到最小。

两种《礼记》的记载肯定有一种不可靠。个人觉得，小戴的说法更可信一点，因为孔子经常强调礼因时而变，损益可知。服饰既是礼的重要内容，自然也不能唯古是尚。在服饰问题上，孔子很可能并不像公孟子这些后学那样绝对，把古言古服看成是成仁的必要前提。

公孟之后，孟子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。相对而言，孟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公孟子：“曹交问曰：‘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然。…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诵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’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如果“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”即可以成为尧这样的善人，“服桀之服，诵桀之言，行桀之行”即可以成为桀这样的恶人，那么，言、服与德行就真的有必然的关联了。

再看看孟子对“古制”的态度：“孟子曰：说大人，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

食前方丈，侍妾数百人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般乐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我得志，弗为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为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食前方丈、驰骋田猎这些“大人”们乐此不疲的事儿，都是我所不愿做的。我所做的，全都合乎古制。“古制”成了孟子在心理上、行为上与权势相抗衡的重要依据。显然，在“好古”这一点上，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。

有趣的是，这位公孟子，如果真的就是公明仪的话，那么他在《孟子》书中也有现身，三处是引他的话，一处是与孟子的对谈。从引述来看，孟子对这位公明仪相当尊重。举个例子：“孟子曰：夫道一而已矣。成颢谓齐景公曰：‘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’颜渊曰：‘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’公明仪曰：‘文王，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？’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这是孟子鼓励滕国世子的话，大意无非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世子只要立志，将来自可以行王道。孟子引用了三个人的言论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，其中就有公明仪的说法。另外几处也大体如此。考虑到公明仪是曾子的弟子、子思的同门，孟子推崇公明仪也许有学派方面的理由。假若真是如此，那么在服饰方面，两人同样强调与德行之间的关联，同样以古为尚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
公孟和孟子的立场既明，让我们再回到墨家的看法。从《鲁问》篇的那两段引文来看，墨子的立场非常清楚，衣服与德行没有任何关系，操同一种语言，穿同样的衣服，有仁人有恶人；穿完全不同的衣服，也都一样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。

唯一需要说明的是“法周”和“法夏”的问题。《庄子·天下》曾说墨子“以裘褐为衣，以跣跣为服”继承的是“禹之道”，后人因此而铺陈说墨家更加好古，他们虽不“法周”，但

却“法夏”，袷褐跂蹻即为夏服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墨子才有资格说儒家的“古”不是真“古”。其实，这种说法根本不值深辩。因为，假如要求弟子穿短褐之衣就是为了实行夏道，墨子不就刚好走到了他所批评的一面（“君子必古言服”）吗？善于推类明故的墨子何至于如此！

要之，在着装方面，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，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一些儒者坚持认为服饰与德行有直接的联系，因此修德最好先从古服开始。墨家则刚好相反，认为衣服与德行没什么关系，就更不用提什么古服今服的问题了。

### 三、“解衣般礴”

在儒墨为衣服问题互争是非的时候，道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道家提倡道法自然，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轻裘、缊袍、粗褐、狐貉等方面伤脑筋。《道德经》提到衣服的地方不多，仅有的两处如下：“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，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余，是谓盗夸。”（《道德经》第53章）“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”（《道德经》第80章）

前句是批评的话，大意是说，在田园荒芜、府库空虚的情况下，在上者还穿着华丽的衣服，拥有许多的财富，那就只能算作强盗头子。后者讲的则是理想的社会，那里的人自得其乐，无论吃什么饭都觉得很甜，无论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美。老子对“文采”的批评与儒家相对立，与墨家比较接近，但“美其服”的说法却有更多的道家色彩，孔子虽有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的说法，但他决不以为“恶衣恶食”是一件很甘美的事。墨家也一样，他

们承认“衣褐带索”是一种“自苦”行为，那肯定是不“美”的，但为了一种信念，却必须去做。

庄子讨论这个问题多一点。最具庄子风格的是下面这段话：“庄子见鲁哀公。哀公曰：‘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’庄子曰：‘鲁少儒。’哀公曰：‘举鲁国而儒服，何谓少乎？’庄子曰：‘周闻之，儒者冠圜冠者，知天时。履句屨者，知地形。缓佩玦者，事至而断。君子有其道者，未必为其服也；为其服者，未必知其道也。公固以为不然，何不号于国中曰，无此道而为此服者，其罪死。’于是，哀公号之五日，而鲁国无敢儒服者。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，公即召而问以国事，千转万变而不穷。庄子曰：‘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，可谓多乎？’”（《庄子·田子方》）

前面我们经常提到鲁哀公，孔子自相矛盾的话都是对他讲的。这一次，谈话的对象却成了他身后一百多年的庄子。谈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，“有其道未必有其服，为其服未必有其道”，道和服没有必然的关联，墨子说过的话，庄子不过重述了一遍而已。所不同的是，墨子说这话时，面对的是儒者（公孟子），所以没有点明儒者的言行不一。庄子“谈话”的对象是鲁哀公，所以才可以说出举国儒服的鲁国真儒只有一人。

喜欢对号入座的人总想论证那位真儒就是孔夫子，这也好为庄子出于颜氏之儒找点根据<sup>①</sup>。不过，即便庄子真的是儒家别派，把孔圣之后那么多贤人都说成不是真儒，于儒家也似乎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。我们还是相信，庄子这里表达的主要是讽刺而不是赞美。

比较吊诡的是，庄子有时候也会穿“儒服”！《庄子·说

<sup>①</sup> 钟泰：《庄子发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74页。

剑》讲庄子与赵文王论剑的故事。文中有这样的对话：“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，事必大逆。庄子曰：请治剑服。”对于这个麻烦的问题，历来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：一是证明《说剑》是伪书，不可信。二是把儒分成达、类、私，以便说明此儒非彼儒。前一种说法宋人就有<sup>①</sup>，后一种说法以近人章太炎主张最力<sup>②</sup>。详细地解释他们的说法不是本文的目的，个人觉得，既然庄书充满“谬悠之说、荒唐之言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让庄子穿一次“儒服”又有何妨！

更何况庄子因家境不好，常常还得穿打补丁的衣服。《庄子·山木》篇称：“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赆系履而过魏王。魏王曰：‘何先生之惫邪？’庄子曰：‘贫也，非惫也。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惫也。衣弊履穿，贫也，非惫也，所谓非遭时也。’”字面上讲的虽然是庄子本人，但要说明的还是那个大道理：道德与衣履没有直接关联，衣弊履穿者可能正是怀道抱德之人。

《庄子·田子方》篇还给我们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：“宋元君将画图，众史皆至，受揖而立，舐笔和墨，在外者半。有一史后至者，僮僮然不趋，受揖不立，因之舍。公使人视之，则解衣般礴，裸。君曰：‘可矣，是真画者也。’”宋元君要画图，来了许多画家，行礼研墨，排队守候。只有后到的一位不仅不趋不立，而且转身就回家了。宋元君派人来看，发现此人赤身露体，盘腿而坐。宋元君马上意识到这才是一位真画家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“衣服”成了一种限制，只有“解衣般礴”，才能挥洒自如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圜冠句屨”的儒服固然

① 苏轼：《庄子祠堂记》，《苏轼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47页。

② 章太炎：《国故论衡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04页。

不自然，刻意“衣褐带索”不也是一种人为的限制吗？

#### 四、在服饰背后

儒道墨之外，其他各家在衣服问题上的看法多为片言只语，如《孟子》书中提到的农家代表许行，有弟子数十人，“皆衣褐，捆屨，织席以为食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。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讨论他们了。值得提及的是，阴阳家有一种说法，认为衣服的颜色与四时、方位必须对应起来，如春月衣青衣、服青玉，夏月衣赤衣、服赤玉，秋月衣白衣、服白玉，冬月衣黑衣、服玄玉等（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）。这种说法对后来王朝更替时所谓“易服色”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衣服是用来穿的。穿衣服本不是什么大事，每人每天都会碰到。穿着本身，积久成习，有时候还成为近乎无意识的举动。可是，当衣服成为学派争鸣的对象时，穿衣服就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常行中的小事。在服饰的背后，可能包含着一整套观念系统。而穿着本身，也常常变成一种姿态，一种体现自家学术宗旨的象征。

儒家如此，道家如此，就连只注重衣服之实用价值的墨家也同样如此。
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墨家对衣服的考虑，大概从来没有超过身体需要的层次。不是御寒，就是避暑。用墨子的话说，这就叫“故圣人为衣服，适身体，和肌肤而足矣”。除此之外，像追求“荣耳目”（漂亮）、“观愚民”（炫耀）之类，全都属于费财费力的无用之举。

墨家这样说，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。既然每个人都有饥而欲食、寒而欲衣的本能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一些人的过度

使用必然会带来另一些人的饥寒交加，所以只有节约用度，有财分贫，兼爱他人，必要时甚至排除一切的娱乐活动，才可以保证让所有人获得最基本的生理需要。墨家的这种想法，不管是否属于荀子所谓的“私忧过计”（《荀子·富国》），却显然有其现实的针对性。其批评的对象既有锦衣玉食的“王公大人”，也包括那些“繁饰礼乐”的儒生。

墨家不仅是这样说的，而且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们的行为甚至比他们的主张还要极端。像裘褐之衣、跣跣之服，无论如何都谈不上“适身体、和肌肤”。墨者留给世人的印象，也常常是“摩顶放踵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、“手足胼胝，面目黧黑”（《墨子·备梯》）、“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，朝得之则夕弗得”、“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。就自奉之薄来说，先秦诸子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对墨家的这种做法，曾有过比较严厉的批评：“以此教人，恐不爱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爱己”、“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”、“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”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，墨家的这种极端行为也许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，那就是警示世人特别是当权者，如何满足所有人冬温夏清、饥而欲饱的生理需求才是政治首先应考虑的问题。

和墨家比起来，儒家对衣服的思考要复杂得多。衣服当然是用来穿的，但穿什么却需要认真对待。材料、形制、色彩、饰品，没有一样可以马虎。显然，儒家关怀的重心已经转向了服饰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。在这种视角下，服饰变成了传统的载体、礼仪的形式、身份的象征，甚至德行的体现，实用的因素降到了次要的位置。

并不是说衣服的实用性可有可无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（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），一个健康而完整的身体是儒者尽职尽责的基础。护养自己的躯体，包括寒暑有节、起居